

社会心态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分析

王俊秀

内容提要 通过总结近年来社会心态的研究,本文从风险社会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社会心态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人口流动、社会流动、社会不公平、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观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强对这些不确定性的分析,将有助于认识和理解社会心态中的风险,从而才可能找到规避和化解社会心态的措施和策略。这也是社会学研究责无旁贷的责任。

关键词 社会心态 社会心理建设 风险 不确定性

王俊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00732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6.01.003

风险社会下人们特别关注各类环境风险、科技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也关注那些社会风险,它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等,特别是社会管理中威胁社会稳定的风险,如社会治安、社会冲突和矛盾等,但是人们往往忽略风险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我们认为,关注社会心理因素产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将有助于对以上这些风险的认识和防范。

众所周知,社会心态是研究社会转型下社会心理特点和变化规律及其内在机制的,社会心态研究从基本需求、认知和评价、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动几个方面来把握宏观的社会心理,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方面存在的风险。只有认识和理解了社会心态中的风险我们才可能找到规避和化解社会心态的措施和策略。这也是社会学研究责无旁贷的责任。

社会心态风险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因其是由广大社会成员内心集合构成,具有隐蔽性,不宜察觉。但同时社会心态风险又常常隐藏于现实事件下,决定社会运转的性质和事件走向,从而具有不确定性。

从风险社会的理论看,风险与“危险”、“灾害”、“安全”、“不安全”、“不确定性”这些概念是相近的。尤根·罗沙等人(2007)就直接用不确定性定义风险,他认为“风险是一种人类所珍视之物(包括人类自己)处于危机中或结果呈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或事件”。大卫·丹尼(2009)认为,“整个社会对不确定性的关注与日俱增,这导致了‘风险共同体’(risk community)的发展。风险共同体的成员来自政府、产业界、工会、公众及其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共同体覆盖了所有人群。现在,对风险的评估是一个多维度的、从‘不可接受的’到‘可接受的’的连续体”。也就是说,在“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成为共同承担和面对风险的利益共同体。既然人类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和社

绝风险,就使得风险问题转化为社会无奈地接受风险程度的问题。人们对风险的不同接受程度影响着他们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关注,产生着不同的情绪反应,风险认知和风险化解也受制于人们的价值观,这些综合的心理对应着人们的各种风险行为。本文根据近年来的社会心态研究对当前社会心态风险作一简要分析。目的是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努力规避其不利因素。

移动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一名博士生的回乡日记在微信中广为流传,许许多多的人对文中的乡愁产生了共鸣,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异乡的不确定感和回不去的故乡交织的复杂情绪。在全球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原来熟悉的家乡走出国门、走进陌生的城市,体验这种复杂的由移动性带来的不确定感。正如,有学者对于农民工这个潮汐式迁徙群体的研究发现,新一代农民工自尊水平偏低,具体表现为自我肯定偏低,自我否定偏高,而低收入、自我社会地位认同偏低、自我污名化、对未来预期影响着自尊水平的高低(段志慧、郑莉君,2013)。还有研究发现,移民城市深圳,生活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其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和安全感水平也均不高,比较起来,移入的农村人口(农村户籍人口)的信任水平最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信任水平最高,而外地城市户口居民信任水平介于二者之间;再以职业来看,农民、工人的信任水平最低(杨青、胡志伟,2014)。再把黑龙江的调查数据与深圳市进行对比研究还发现,深圳被调查者在安全感的8个方面(食品安全、信息和隐私安全、环境安全、医疗安全、交通安全、劳动安全、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和安全感总分上都低于黑龙江被调查者。而安全感与社会公平感、生活满意度、社会情绪、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和未来预期又呈正相关关系(全静,2014)。通过2011年和2012年全国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两年中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高于城市居民,但从不同户口类型来看,外地户口居民生活满意度低于本地户口,外来的农业户口居民生活满意度最低(王俊秀、全静,2013)。也就是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移入人口还在不断增加,从移入人口的社会心态研究看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新移入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原有人口的接纳,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生活习惯、文化差异等都是社会治理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社会流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社会流动是指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通常是指个人一生中社会阶层地位的改变和与父代或子代相比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然而,当今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不同时期的社会流动又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我们近年来多个社会心态调查所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果看,自我归类的社会阶层地位有下移现象,也就是人们普遍自我选择了低于统计意义上的阶层位置,即一些属于上层或中上层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甚至中下层,属于中层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下层或下层,也就是说,大量的人有底层认同倾向,这种底层认同无形中成为了社会两极化的重要原因。有研究显示,主观社会阶层比经济收入对于一些社会心态指标的影响更为一致,自我社会阶层认同越高安全感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社会公平感受越高,社会支持得分也越高(高文珺等,2013)。主观社会阶层认同越高,社会安全感得分也越高(全静,2013)。通过对超大城市市民认同调查发现,被调查者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所在的城市(黄智宽等,2015)。而通过社会情绪分层的研究也发现,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和单位性质等分层指标与情感分层具有密切的关联。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层影响了积极情感和中性情感。处于情感分层上层的主要是个人月收入1万元以上,职业为公务员和党政部门、企业事业单位领导,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群体(陈满琪,2015a)。因此,我们认为,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下移、底层认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形成了以身份认同自动划分的社会心态阶层,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感、生活满意度等重要的社会心态指标。个人的社会态度、社会价值判断、社会情绪表达将由其自我认同的社会身份决定,失去了客观性,这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必须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不公平感的社会风险

社会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社会不公平的另一个观察视角是领域公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显示,教育制度公平感最强,约为4点量表的3,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区域待遇公平感最弱,为2.22,接近不太公平水平;资源分配公平感和司法政治公平感分别居于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为2.48和2.52,得分在量表均值2.5附近,居于不太公平和比较公平之间。调查对象对于选拔党政干部和财富及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评价较低,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分别为57.6%和63.6%)选择不太公平和非常不公平。研究还发现,司法政治公平感越高,越容易形成积极的社会认知和信心,越会肯定地方政府工作,社会信任状况也更高,对国家实力的预期也会越高;资源分配公平感越高,社会认知和信心就越积极。教育制度公平感越高,整体社会公平感、地方政府工作评价、社会信任程度、个人未来生活和国家实力预期也越高,并伴随较多的积极情绪和较少的消极情绪;区域待遇公平感越高,整体社会公平感也越强,对地方政府工作评价也越高,生活满意度也相应地高。(高文珺,2015)

社会不公平的另一个观察视角是不同人群的公平感,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公平问题。陈辉、杨宜音通过(2013)对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四川的250位进城农民工的研究发现,64%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平,47.1%的人觉得他们在打工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普遍较高,81.8%的人认为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好,比较发现,未来预期好的人更认为社会是公平的。最近有学者研究还发现,在深圳农村户籍居民的生活压力高于城镇户籍居民,他们认为,无论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还是在生活状况上,外地农村户籍人口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都很高,社会地位的相对剥夺感高于本地农村户籍人口,在另外两项上仅次于本地农村户籍人口(杨青等,2015)。

此外,社会腐败也极大地破坏着社会的公平正义,降低社会的公平感。研究发现,对腐败严重程度的评价、干部廉洁比例、对反腐成效评价和对反腐的信心都与社会公平感的评价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调查还显示,民众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腐败严重程度平均在“很严重”和“比较严重”之间,得分为4点量表的1.79。民众反腐的信心得分为1.95,在“很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之间,81%的民众对反腐败的信心程度为“比较有信心”或“很有信心”(谭旭运,2015)。

这些表明,社会规则和社会运行中也包含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这其中,社会公平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基本、最迫切要求之一,不公平感的扩大和加深将直接引起社会问题和冲突。

不信任的风险

经过多年的连续调查我们发现,社会的一般信任水平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波动(饶印莎等,2014),当社会信任水平下降时,社会信任将陷入困境。据全国调查结果发现,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的比例分别为51.0%和5.5%,也就是说,倾向于认为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比例为56.5%。个人经历和来自媒体的间接经验不断强化和替代强化着社会成员的不可信任。应飞虎(2015)在“小悦悦”事件后收集了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件,最终查明真相的案件约占80%,其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起,诬陷扶人者84起,这一结果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诚信危机的热议。众所周知,信任研究可区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有研究发现,对政府的信任度高对于制度信任体系的影响很大。比如,法官、警察和政府官员对于人际信任改善的影响显著,政府的渎职行为会降低社会信任,社会机构的欺骗行为将显著降低社会的信任水平(饶印莎等,2014)。社会不信任表现为由关系远近决定的模式,调查发现,在不同社会角色中以信任程度高低排列,分别是亲戚朋友、教师、医生、邻居、警察、法官、领导(上司、老板)、党政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办事人员、企业家和陌生人。从平均得分情况看,亲戚朋友和教师得分高于3(4点量表),也就是高于“比较信任”水平;医生和邻居接近

“比较信任”水平;陌生人低于2,处于“不太信任”水平;其余社会角色介于“不太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但只有企业家低于信任尺度的中点,其余社会角色高于中点,倾向于“比较信任”。

因此我们说,社会不信任的加剧直接影响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和谐,降低了社会运行的效率,增加了社会的摩擦和冲突,阶层间的不信任等会给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凝聚带来不确定性。

隐藏于社会情绪中的风险

在这里我们将特别强调社会情绪是因为,社会情绪风险之一是社会情绪中那些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的因素。据对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的调查发现,被调查的5010人中,20.3%的被调查者在自测心理健康得分上表现出不良倾向,22.5%的被调查者在自测的社会健康上表现出不良倾向(陈珊,2013a)。心理健康与社会心态的许多因素间存在着交互作用。研究发现自测的心理健康与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都存在正相关关系(陈珊,2013b)。陈满琪(2015b)考察了身体健康与人们的日常情绪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民众感受到较高的健康威胁,体验到较低的积极情绪和较高的消极情绪;民众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感知是最重要的预测情绪体验的因素;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健康的心理感知与情绪体验间的关系。还有研究也发现,社会关系和正式组织是影响日常情绪的重要社会支持来源,自己和家人的就业、住房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日常情绪的重要生活压力源,预期自己未来的积极情绪和评价过去的消极情绪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

社会情绪是一种社会信号,也是一种社会能量,从这个意义上社会情绪的风险包含两个方向,一是“情感堵塞”风险,一是“后情感社会”风险。前一种是德国心理学家马茨(2013)所使用的概念。他认为人的健康发展需要满足他的基本需求,生理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在不同的需求满足下人会有相应的情绪和情感,即使是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有情感反应,但如果在外界条件的压抑下情感不能得到释放,就会产生情感阻塞。长期的情感阻塞会成为一种心理问题和疾患,不断寻求替代的代偿方式。对于社会心态意义上的社会情绪也是一样的,所谓的社会消极情绪如果不能得到正式的渠道释放,长期淤积的消极能量会一直寻找替代的释放方式,构成社会情绪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后一种“后情感社会”是社会学家 Mestrovic (1996)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中忽略了情感的因素,由于情感被过度操控,人们的情感变得麻木,后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后情感社会。“后情感社会”的风险表现为当前社会开始讨厌煽情、讨厌心灵鸡汤,正是由于情感被过度包装、精心传递,使得商业化、廉价的,甚至虚假的情感泛滥,人们不能体会到真诚的情感,开始逃避、抵制和反对包含了这类情感的活动。

社会价值观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社会转型和变迁下人们的价值观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英格尔哈特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多国比较的结果认为,代际价值观已经从强调经济和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到了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认为,这种价值观转变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匮乏假设”,就是物质必需品和人身安全与生存直接相关,物质的匮乏会使得人们把“物质主义”的目标放在首位,在物质满足后,人们的归属感、尊重、审美等“后物质主义”的目标出现了。第二个假设是“社会化假设”,认为个人的基本价值观是其未成年时期社会条件决定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发达工业国家大部分人口不是在饥饿和经济不安全条件下成长的,他们已经表现为明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2013)。英格尔哈特猜想中国尚未发展到其多数人口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的阶段,也就认为中国还未进入后现代价值观开始主导年轻人的阶段,这种转变将在今后的几十年发生。他用提到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把职业上的自我实现作为首要目标(英格尔哈特,2013)。

有学者通过对工作价值观的调查发现,居民对于工作的“安定保障”重要性最为重视,即使是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高的居民;其次是“和谐互信”与“地位、权力和财富”;而“自我实现与成就”、“创造力”

得分最低,其次是“心灵成长”,“利他服务”、“自主独立”和“均衡生活”上得分居于中等(王俊秀等,2015)。此外,对价值观的研究还发现,人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弱化(高文珺等,2014)。这主要是因为年轻的群体受到西方消费思潮的影响,物质主义价值观更高(李原,2015a)。高物质主义者比低物质主义者感受到更多消极情绪,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李原,2014)。高物质主义者在对外部目标的追求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这个循环体系维系了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却也带来更低的自我评价、更高的不满意感和更负面的情绪反应(李原,2015b)。尽管说生存安全依然是主导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应该说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同人群中,即除生存安全之外,健康安全已经成为另一个影响力。一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影响着社会心态,由于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可能是长远和非对应的,因此,社会价值观更具不确定性。

英格尔哈特(2013)指出生存安全是后现代价值观的起源。他认为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生存安全具有不确定性和生存不成问题的人在价值观上是一定有差异的。因此,现代化转型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安全感需求。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小康正在消除社会的生存的不安全感,通过法制建设建立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法制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消除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通过社会建设建立社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消除人们的生存不安全感,化解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一过程也正式英格尔哈特所讲的“不安全感下的价值体系”的建立过程。

社会心态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化解

社会心态中存着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是以单一问题表现的,而是作为当前社会结构下,社会成员和社会运行体系之间的不协调和冲突呈现的,这一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系统性的,局部的调整只能起到部分缓解,而彻底的改变必须有顶层设计。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分别以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社会建设来面对和处理不同历史时期的突出问题和推进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样的顶层设计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目前社会现状和环境来看,虽然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相结合依然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政策,但是无论是社会成员表现出的一些个体心理问题,还是作为社会心理体现的社会心态问题,都不是仅从经济、法治和社会手段能够解决的,需要从新的视角来分析,新的思路来解决。适时提出社会心理建设,一方面把社会治理从宏观的社会结构、法制体系、经济结构延伸到更为微观的个人、集体和群体层面;另一方面从外在的社会环境建设深入到人的内在心理、社会心理氛围、社会心理环境的建设,是社会建设的补充和扩展。社会心理建设也不同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心理建设是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依据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规律,把个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心态的培育相结合,其基本内涵超越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此外,社会心理建设更有利于激发人的潜能,通过社会成员的成长和进步来推行社会创新,顺应社会的需求,把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和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

无论是经济建设、法制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是以一定的社会心理为基础的,良好社会心态是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有力保证。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建设主要包括社区、组织、环境等实体建设和社会结构调整、社会流动机制、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社会保障体制、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建设,社会实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建设则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但这其中的核心是制度建设。社会建设的核心是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是社会成员共同情感和道德规范的建构。社会建设与社会心态存在内在的关联,当社会问题或矛盾处理失当或长期得不到化解,可能会渐渐固着,形成突出的社会心态,成为一种影响社会的社会气氛。客观准确地认识一个时期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建设的需要,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得以有效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不良的社会心态对社会管理起妨碍和破坏作用,社会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共同努

力,而社会共识的形成要依靠社会心理建设。反过来,社会心理建设与社会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心理建设也是社会建设的直接目的,满足社会需求,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尊重公民的价值和尊严,致力于民众的幸福感也是社会建设的目的。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到“心理建设”的思想,其基本的意图是启迪民智,改变民众固有的心理。他指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孙中山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体会到社会心态的核心作用,它警示我们在今天社会转型和变迁中,社会心态依然是一个动力因素。我们要通过社会心理建设,使民众认识到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面对。通过深入研究社会心态现状,制订切实有效的社会心态引导策略,防范可能的社会心态风险,化解社会心态中存在的确定性。

我们认为,推动社会心理建设化解社会心态的风险和不确定可依赖两个路径,一是个体心理建设,二是狭义的社会心理建设。

个体心理建设关注个体一生中心理的发展,包括一个人成长全过程中的身心健康和健康人格的养成,以及在不同人生阶段所经历的成长困惑和挫折、衰老和死亡和社会环境适应等多方面。这些内容与社会发展环境及变化有关,更主要决定于个体的社会心理特征、人格特征。国家应该在更高层面制定全社会的心理建设规划,为个人的身心健康提供全面支持。

狭义的社会心理建设包含社会环境、社会稳定、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社会共识、社会价值观、社会情绪等方面的建设。与这些紧密联系的是社会心态的核心内容,如社会认知态度、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观等,他们共同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心理建设的主要内容。而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人民幸福和社会发展也都是社会心理建设的重要研究内容。

总之,为了化解目前社会心态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持续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依然是今后努力的重点,特别是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调动社会力量满足中高收入者的差异化需求。当然,这中间提高保障水平是提高社会整体安全感的关键。我们要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参与使得社会成员不再有局外感,变社会目标为个人目标,使得命运共同体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凝聚力。可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分配资源,缩小权力距离、缩小社会距离来加强社会凝聚力。通过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完善社会信用体制,建立和完善保障诚信的法律体系,来重建社会信任,弥合社会疏离。通过完善公民人格来提高社会责任感,培育公民情操,形成优良社会道德标准,来约束社会成员,提高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化解社会离散力量。通过建立共享价值观、形成普遍社会发展和成长共识,朝着合理的社会目标和社会预期努力,形成文化融合、社会团结、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陈辉、杨宜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研究》,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 陈满琪:《情感分层的初步探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 陈满琪:《身体健康与情绪体验的关系——基于山东烟台数据的调查》,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4. 陈满琪、王俊秀:《民众不同生活领域情绪体验的差异》,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5. 陈珊:《北京居民心理健康调查报告》,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 陈珊:《北京居民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报告》,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7. 大卫·丹尼:《风险与社会》,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
8. 段志慧、郑莉君:《杭州新生代农民工自尊调查》,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9. 高文珺:《社会公平感的特点及社会心理效应——基于2013“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0. 高文珺、杨宜音、赵志裕、王俊秀:《几种重要需求的满足状况:基于网络数据的社会心态分析》,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1. 高文珺、杨宜音、王俊秀:《社会文化价值观与社会现状感知——基于深圳、哈尔滨、黑龙江某垦区的对比研究》,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2.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徐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13. 何凌南、熊希灵、阿梅:《2014-2015年微博热点事件网民心态分析》,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4. 黄智宽、邓立邦、王列娜、杨宜音、张蕾、何凌南:《中国超大城市认同感调查报告(2015)》,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5. 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王淳波、张宝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4页。
16. 李原:《物质主义价值观调查报告——基于黑龙江居民的调查数据》,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7. 李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子女赡养的孝道责任及孝道焦虑的关系研究》,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8. 李原:《物质的追求能否带来快乐与幸福——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影响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9.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0. 全静:《2013年黑龙江省和深圳市居民安全感分析》,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1. 饶印莎等:《2013年中国八大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报告》,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 谭旭运:《中国人腐败与反腐败感知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4. 田静、吴建平:《北京市公众对大气污染的风险认知状况调查报告》,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5. 王俊秀、谢静、王萍、张士化:《北京市西城区居民工作价值观调查》,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6. 王俊秀、全静:《2011-2012年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报告》,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7. 吴建平、许志敏、韩涛、尹佳骏、李娜、卓敏、张亚京:《北京市社区居民主观知觉的环境质量报告》,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8. 杨青、胡志伟:《移民城市人际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王俊秀、杨宜音:《中国杨青、唐璐、张小娟,2015,“移民城市居民生活压力与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9. 应飞虎:《九成真相率如何突围“扶人困局”》,《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6日05版。
30. 尤根·罗沙等:《风险的认知结构》,见伯内德·罗尔曼、奥尔特温·雷恩编著《跨文化的风险感知》,赵延东、张荣彪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方心清]